



培文·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

LIFELINES

全球史纲

FROM OUR PAST

人类历史的谱系

A New World History

L. S. Stavrianos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 著

张善鹏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

LIFELINES

全球史纲

FROM OUR PAST

人类历史的谱系

A New World History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 著

L. S. Stavrianos

张善鹏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60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 /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Stavrianos) 著；
张善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
(培文·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
ISBN 978-7-301-27143-8

I. ①全…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世界史 IV. 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5684号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 by L. S. Stavrianos

Copyright © 1989 by L. S. Stavriano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 Quanqiu Shigang
著作责任者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L. S. Stavrianos) 著 张善鹏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宁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14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6.75印张 230千字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致谢

本书是我毕生探寻和思考的结果。限于篇幅，我无法列举详细的致谢名单，只能对他们深鞠一躬，聊表谢意。不过，我要格外感谢那些阅读和批评过本书部分手稿的人，他们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埃尔曼·谢伟思 (Elman R. Service)，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玛丽·克拉克 (Mary E. Clark)，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艾伦·雷恩 (Allen Lein)。我尤其要感谢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约翰·道尔 (John W. Dower)，他顶着其他课业的压力，通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了详细而深刻的批评意见。我当时虽然十分自负，但对他的批评十分感激，至今仍念念不忘。我最为感激的是本书编辑汤姆·恩格尔哈特 (Tom Engelhardt)，他从不保留自己的意见，就像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他敦促我反复斟酌，并把书稿从头到尾加以修正。这份独特的经历弥足珍贵，我本人感到极为受用。

在本书写作期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满足了我的借阅请求。我也要对杰奎琳·格里芬 (Jacqueline Griffin) 表示感谢。当本书的书稿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之间来回穿梭时，她尽职尽责地反复录入了那些数度起死回生的文字。

目 录

致谢 003

导言：我的个人历史谱系 001

第一章 氏族社会 015

人类的起源 015

从灵长动物到人类社会 018

昆族人 023

氏族社会的谱系 030

第二章 朝贡社会 044

从氏族社会到朝贡社会 044

朝贡社会的性质 050

形形色色的朝贡社会 053

朝贡社会的谱系 063

第三章 资本主义社会 090

- 从朝贡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090
- 商业资本主义（1500—1770） 096
- 工业资本主义（1770—1940） 113
- 高科技资本主义（1940年以来） 137
- 困难重重的新时代：1975年至今 158
- 资本主义的历史谱系 159

第四章 人类的前景 196

- 新轴心时代 196
- 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204
- 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213
- 第三世界的替代方案 224
- 更具生命力的人类命脉 241
- 人类的前景 247

每一代人都必须撰写属于自己的历史，并对已经写 3
好的历史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前人的结论不正
确，而是因为一种实际的考虑。之所以需要不同的答案，
是因为需要回答不同的问题。站在旅途的新起点上，就会
看到眼前呈现的是既陌生又复杂的全新景观，要求人们对
传统的图示加以扩大。

——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

导言：我的个人历史谱系

宏大的叙事，其实都是自传。

本书也是一部宏大叙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大萧条时期。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在一座贫民窟的餐厅做服务员，好为不太宽裕的家里挣些口粮。那家餐厅坐落在美丽的温哥华市区。每天，我都要接待一些穷困潦倒的顾客，他们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无尽的财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我年青的头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餐厅的顾客大多曾在农场、森林、矿场或渔场做工，但在大萧条那几年，他们许多人都失了业。由于挣不到薪水，他们只得靠当地救济机构发放的每周用餐券过活。领到用餐券后，失业者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贫民窟餐厅。只 4
有在那里，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几分钱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由于不列颠哥伦比亚是加拿大冬季最温暖的省份，所以，加拿大的失业人口也就汇集到了温哥华（这个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唯一一座加拿大大城市），就像美国的失业人口汇集到了加利福尼亚一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失业者

来到这里。他们一跳下货运列车，就向救济机构走去。我们那家餐厅每天接待新顾客的高峰时段，可以根据货运列车从寒冷的草原省份驶入温哥华的时刻表推算出来。

——我当时虽然还是孩子，心里却也很清楚，这些失业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鬼，也有许多人在工厂、矿场、木材厂、渔船或罐头厂工作期间因伤致残。断指、残腿、截肢、眼罩，十分常见。在这些人居住的贫民窟，我曾打过好几年工，度过许多个周末和“暑假”。此类场所常见的低俗标志，那里应有尽有：廉价的住所，当铺，啤酒馆，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

我们那家餐厅对面碰巧有一座广场，被称为温哥华版的“海德公园”（Hyde Park）。每天晚上，世界产业工会（Wobbly）的演讲者都会在那里发表一些充满火药味的不同凡响的演说。从肥皂箱上讲演过后，他们通常会到餐厅买咖啡和馅饼。此时，天色已晚，餐厅里没有多少顾客，我就能闲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和为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声言的那些发言人聊天。我对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吃惊不已。他们批判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幻想；他们对市级、省级和自治领的官员不屑一顾，称其为统治阶层的“马屁精”，而非人民公仆；他们提到通常受人爱戴的“骑兵”（加拿大皇家骑警）时，称其为“哥萨克”；他们声称，加拿大的洲际铁路，以及他们所熟悉的货运列车，其管理者和所有者应该是建造它们的工人，而非从中牟利的银行家和股东。

这些话令我这个懵懂的少年目瞪口呆，但其震撼程度却比不上周围的现实。那些年，我的人生态度非常严肃。对于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以及自己每天观察和经历的事情，我力图马上理出头绪，找出答案。有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美丽的温哥华拥有无尽的潜力，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悲惨，差距却是如此残酷？我知道自己那些顾客和朋友憎恨失业，渴望做工。显然，数以百万吃得很差、穿得很差、住得很差的人们亟需食物，但却无人种粮；亟需木材，但却无人加工；亟需鱼肉罐头，但

却无人制造。然而，那些无缘做工的失业者为何不能从事这些自己十分在行的工作，何况加拿大社会又迫切需要这些工作？为什么？

虽然温哥华的海滩和山峰极富魅力，我也曾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去游山玩水，但却发现自己反复回到这个问题，令我苦恼不已。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的答案虽然令我震惊，但最终却还是无法让我满意。不过，他们至少对我进行了鞭策，让我产生疑问，并从知识和情感的角度去挑战那些既有的答案。

起初，这种挑战令我形成了一些看法。然而事后回想起来，那些看法实在是单纯得可笑。当时，我对一种理论十分着迷，该理论认为，加拿大的问题可能源于其历史上缺乏美国独立革命那样的革命运动。美国是个富国，相对而言，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富裕（我们这些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加拿大人当时误以为情况就是这样）。在18世纪，美国人成功地推翻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加拿大人却依然留在大英帝国，在我看来，我们这些身处困境的帝国臣民的出路，或许就是发布自己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曾对我说，英国人的牟利方式就是剥削加拿大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一假说与此相符，从而增加了几分对我的吸引力。

这些年轻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有些幼稚，但滋生它的那些贫民窟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比我在任何课堂上或书本里学到的东西都更加深刻和长久。不管听上去多么陈腐，那家贫民窟餐厅永远都是我的第一所“大学”。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如今依然成立——官方论调与社会现实之间，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使所有的社会都深受其害。一个历史学者的角色，就是阐明那种差距的起源。

这一看法，即便是在当时，以我的个人经历为参照，也是不言而喻，无可辩驳。因而，当我发现老师们坚决不同意我的观点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我直截了当地追问他们为何选择讲授历史时（这是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选择的进修科目，所以不足为奇），他们含糊其辞，说什么有教养的人士需要

熟知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力来判断,这种回答十分牵强,我拒不同意。所以,我坚持了自己研究历史的初衷,不是为了装点文化,而是把它当作理解社会的工具。

1937年,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随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我的研究和写作所围绕的专门题目,反映了贫民窟“遗产”对我的深远影响。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巴尔干半岛的历史,该地区在19世纪的作家眼中,就是当时欠发达的第三世界。这块半岛由于连年战乱,革命频发,还滋生出不少国际危机,所以常被人们称作“欧洲的火药桶”(powder keg of Europe)。“火药桶”这一比喻虽已深入人心,但却极少有人重视欧洲列强(沙皇俄国、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德国、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以及大英帝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曾刻意给这一地区提供“火药”。巴尔干半岛上的诸多小国其实都是棋子,与当今许多中美洲小国及东南亚国家一样,在外交棋局中任由那些大国摆布。

我也注意到一些特例,当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能够使其民族和宗教矛盾服从半岛的合作和统一大业时,列强总是会无一例外地出面进行干涉,为了达到其“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目的,它们常会挑唆某个巴尔干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为敌。我决定从内部研究巴尔干的历史,而不是从欧洲大臣那些空洞的观察出发。我的博士论文“巴尔干联盟运动史”,以及后来出版的一部内容更加全面的著作《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The Balkans Since 1453*),在学术界为我奠定了“巴尔干问题专家”的地位。

不过,一个巴尔干问题专家的生活很难跟得上教室外面动荡不定、急速变化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股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曾经存在几个世纪的欧洲帝国。在我家附近,我执教的西北大学的学生不断被送到朝鲜服役。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显然对自己此行的目的和原因知之甚少。我越是思考,就越发意识到,美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是多么严重,这一问

题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不仅存在于西北大学，而是存在于所有的学科，以及所有的校园。

对此，我本人的回应，就是在我所从事的学科领域——即大学新生必修的历史学导论当中，竭力纠正这种极为猖獗的歪曲史实现象。这门课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称作“西方文明”简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老师和课本都是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从地中海讲到古希腊罗马，从阿尔卑斯山讲到北欧，最后从大西洋讲到新大陆，在那里，人类文明才达到了巅峰。我们当中极少有人懂得，在追溯“文明”西进的历程时，我们已竭力将亚洲人、非洲人和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人的大部分历史清除出了学生的视野。我们之所以提及日本，只是为了交代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1]的历史背景；之所以提及印度，只是为了介绍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2]的功业；之所以提及非洲，只是为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3]和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4]的出场打好铺垫。

我们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排他性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取得了全球霸权。在将势力平衡的背景歪曲之后，历史教学当中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就显得既正常，又恰当。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殖民地革命浪潮，迅速而明显地粉碎了旧有的背景，就像任何一张地图业已显示的那样，地名和颜色正在发生变化。慢慢地，我们当中有些人开始不情愿地承认，我们为学生罗列世界历史的方式已经过时了。

此时，我决定舍弃巴尔干历史研究，转而探索世界历史。当时，作为正

[1] 马修·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1853年他率领美国舰队，逼迫日本开港通商。——编注

[2] 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英国殖民者，孟加拉首任省督，集冒险家、军事家、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英国人视其为英帝国最伟大的缔造者之一，殖民地人民则视其为罪恶的强盗。——编注

[3] 戴维·利文斯顿（1813—1878），英国著名探险家，传教士，在非洲一待就是30年。——编注

[4] 塞西尔·罗兹（1853—1902），又译罗得斯，英国政治家、商人，罗得西亚（Rhodesia）的殖民者，罗得西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他通过剥削南非的自然资源，攫取大量财富，死后设立罗兹奖学金。——编注

规的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世界历史尚未得到普遍承认。就这样，我开始着手开设一门新的历史学导论课程，它既要涵盖全球，又要便于讲授。这就需要尝试去除许多古老的话题，它们虽然适用于讲述西方简史，但却很难适用于为期一年的全球史通论课程。

在纽约卡内基集团的支持下，我得以腾出大量时间来设定那些基本的新概念和新框架。我最为根本的主张，就是认为世界历史并非国别史或区域史的总和，而且也不能仅被视为国别史或区域史的总和，而是必须涵盖包括世界历史各个组成部分在内的一个全新的整体。

在1950、1960年代，也有其他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沿着这些思路展开思考和工作。作为大家辛勤努力的结果，书刊上，以及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视角。渐渐地，全球视野赢得了一些人的垂青。一个可信的证据就是，出版商正在迅速而大量地推出新版世界史教材，以期在不断扩大的图书市场上快速盈利。这一方法之所以能够成功，幕后的关键因素显然是当时越南、南非、中东等地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事件要求教师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

虽然世界历史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如今已不再遭受严肃的质疑，但在近来，出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新的问题不再是应不应该有世界历史，而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与1950年代开始呼吁建立世界历史学科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正如1950年代的世界不同于二战之前的世界一样。就像殖民地革命、朝鲜和越南的战争（以及“冷”战）引发的全球动荡需要建立全球取向的历史新学科一样，如今出现的正在引发更大动荡的事件，包括环境恶化、资源耗竭、全球范围的结构性的失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以及最为严重的“核冬天”（nuclear winter）的阴影，都迫使我们对世界历史进一步加以改进。再一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编写历史，以适应我们当下的经验和需求。

问题已不仅限于将西方与非西方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或是像汤因比那样

去评价文明兴衰的意义，甚或是去评价现代列强的兴衰，就像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5]最近分析的那样，不论这些努力是如何重要，如何有用。^[6]问题已经涉及如何评价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自身——我们的人性、价值、成就和前景，本质究竟如何。

这里有个矛盾，此类整体评价的必要性源于一个事实，即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一直都在地球上遥遥领先。我们的“成就”如此巨大，以至我们如今正在超越数十亿年的自然选择过程，开启了一个人为选择的进化新时代。我们不仅决定着地球上的动植物的命运，而且决定着那些动植物（包括我们自身）基因的命运。进化过程已不再单单取决于基因——或是引发物种灭绝的自然灾难，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人类。由此，进化过程也就被改造成了—种数量意义上的新型“定向”过程，至少从我们控制着地球和以地球为居所的生物的命运来看，情况确实如此，不管我们是否充分或自觉地接受这种责任。就像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7]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面对的只有自己；他再也找不到别的伙伴或敌人”^[8]。

可以肯定，我们最终面对的将只有我们自己，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我们再也无法回避下面这个问题：这个人类已经取得空前的优势和成就的时代，为何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完全可能的时代。

南非政治家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9]曾经

[5] 肯尼迪(194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战略学家，曾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代表作《大国的兴衰》。——编注

[6]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8)。

[7] 海森堡(1901—1976)，德国核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1927年提出“测不准原理”，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编注

[8] 转引自马赫(R. Maheu)发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报》(UNESCO Courier)1966年2月号第30页上的文章。

[9] 史末资(1870—1950)，南非及英联邦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1919—1924、1939—1948年出任南非总理，1941年授英国陆军元帅军衔。其最大成就是创立了国际联盟。——编注

宣称：“一回顾历史，我就感到悲观……不过，一回顾史前历史，我就感到乐观。”^[10]这一言论不仅说中了历史的要害，而且就历史写作本身而言也很正确——因为在评价人类的历史时，我们的史前历史通常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加以缩短，仿佛史前时代人们的观点和行为可以视作某种亚人类的东西简单地不加理会。然而，我们的“历史”是在文明——以及文字——不到 6000 年以前在美索不达米亚首次出现之后才开始的，但据考古学家新近在中东的发现，人类的各种经历可以上溯到 5 万—10 万年前“智人”的出现。如果进一步追溯人类的原人起源，我们就必须把时段扩展到大约 500 万年前，才能涵盖我们的南方古猿祖先。尽管我们的历史和意识已经自然而然地被过去几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事件所主导，但事实却依然表明，史前历史毕竟占据了人类遗产 99% 以上的部分，从而也就可以为人类可能出现的情况，甚或人类未来的前景，提供一个非常独特而且通常更有希望的视角。

近来，在我们史前祖先的生活方面，人类学家有了重大发现。这些发现已经帮助我们清除了关于“人性”（human nature）、“人种”（race）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某些陈规陋习、文过饰非，以及偏见，而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过去却是非常肯定地书写了非常之多的荒唐文字。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凭借越来越多的证据以及合理的自信，来评价人性的本质和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遑论人类社会在上万年间而非短短几个世纪内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而经历的成败。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 20 世纪晚期任何一个负责任地预估人类前景的人所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这些都是关乎人类“命脉”（lifeline）的问题，需要从既包括史前历史，也包括历史本身的人类历史出发去加以界定和追溯。

即使存在这种需要，也依然存在是否可行的问题。汤因比的文明兴衰史

[10] 转引自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人类破坏力分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3, p.vii.）。

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肯尼迪的大国兴衰史也跨越了五个世纪，史前历史则要上溯到 500 万年以前——具体时段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界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范围内，我们这个物种的进化过程如何才能以本书这样的篇幅来概括，并加以合理解释？事实表明，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当中，这就提供了一个简单可行的起点。这些社会环境，或曰社会组织，曾以无数的形态在世界各地出现，具体取决于气候之类的地理因素（此即爱斯基摩社会与阿拉伯社会的差别所在），或是外在环境（此即安第斯社会与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差别所在），或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程度（此即与外界隔绝的澳洲土著居民与主要位于中东地区的民族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经历的原因）。

所有这些因素以无数种方式排列组合，形成了过去和现在人类社会的总 11
和。这个总和非常巨大，相应地，对那些社会加以评价，并在它们与我们的时代和需求之间建立联系，也就成了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当我们注意到人类过去和现在数以百计的社会可以广义地分为三类时，这项任务才变得更具可操作性。这三类社会分别是氏族社会（kinship societies），涵盖了大约公元前 3500 年以前的所有人类共同体；朝贡社会（tributary societies，也叫文明社会），最先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出现在中东，随后逐渐扩散，与那些自发形成的朝贡社会一起，遍布澳洲之外的世界各大洲；自由市场社会，或曰资本主义社会（capitalist societies），最先于公元 1500 年左右（具体时间仍有争议）出现在欧洲西北部，随后不断扩散，直到遍布世界，并主导全球。

这三种社会制度的寿命都很长久，因为它们都满足了人类当时的某些基本要求。不过，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它们也迟早都会在内部出现某些矛盾，随后变得日益失调，直到每一种社会（我们目前这种社会除外）让位给另一种可以解决上述矛盾的新社会。人类最初的需要是如何得到满足的？那些矛盾又是如何出现的？它们在过去又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启发当下，因为我们的社会目前采用的基本框架是相同的，虽然在资本主义及其

发展出来的高科技的驱动下，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拜人类社会的这一共性所赐，我们得以沿着一条贯穿三种社会的线索来考察某些关乎人类命运的基本问题，进而分析和比较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实践和经验。为清晰起见，本书甘冒过度简化的风险，将这些“谱系”分成四类：生态（ecology）、两性关系（gender relation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和战争（war），来分析上述三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选择这四个题目，不是由于无数的其他题目无关紧要，而是由于它们涵盖了与当下直接相关的人类经历当中最为广泛的领域，从而可以将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

有人也许会反对，认为如此简略和挑剔的通论并非真正的世界历史，因为它未能展示纷繁复杂且丰富多彩的人类史诗。情况确实如此，所以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将本书的主旨加以明确界定。

本书绝非一部面面俱到的人类历史专著。最近出现了几部这样的著作，而且都不难查阅。^[11] 本书则在内容上进行了大胆取舍，只会分析那些对我们当下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问题。简言之，本书探讨的是那些有用的历史。当然，探寻有用的历史，就要涉及人类社会的集体经历和共同思考，因为它们合成了可以指导人类未来发展的共识。不过，在探寻历史的意义时，我们也有必要识别一些陷阱。这种意义并不一定要限制在“最近”（recent）。例如，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比我们今天的工作量要少，遭受的饥荒和营养不良问题也可能比现在的 50 亿人要轻，与我们从晚间新闻报道中获取的大部分资讯相

[11] 新近的作品包括本书作者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现在》（*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4th ed., Prentice-Hall, 1988）；威廉·麦克尼尔的《人类社会简史：从史前到现在》（*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2nd ed., Prentice-Hall, 1987）；以及 H. 托马斯（H. Thomas）的《世界简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Harper & Row, 1979）。关于这种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玛丽·克拉克（Mary E. Clark）的佳作《阿里安德涅之线：新型思维方式探析》（*Ariadne's Thread: 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 St. Martin's, 1989），该书是一位生物学家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几十年前提倡的“新型思维方式”（new modes of thinking）所作的大胆探索，极富启发意义。

比，这一点可能更有意义。

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历史学家理解的“意义”（relevance）不应混同于“预言”（prediction）。对于当下的问题，或是想象中的未来将要面对的问题，不能指望从历史当中获得明确的答案。诚然，历史不像物理或化学那样，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历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的行为很难准确预测，不能像化学家那样，可以更有把握地预言 A 元素与 B 元素混合后将会发生何种反应。历史不是水晶球，不能预言哪个政党会胜出，哪个国家领导人会遇刺，哪个国家会发生革命，哪个地方会爆发战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得出这样的推论，认为历史揭示不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心探寻有意义的模式，并以娴熟的手段和负责的态度开展研究，就能使历史成为一门有用的学科。历史的用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提供一个考察过去和现在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会预言将要发生什么，但却可以揭示人类的灵活性和潜能，那是我们的遗产。

最后，历史固然不是预言，但却也不单单是记述史实。人们经常认为，通过罗列史实，史实就会不证自明。这种观点不可取。罗列史实并不能说明 13 史实。我们今天所要承担的根本任务，不是继续积累更多史料，而是阐释我们早已掌握的大量信息。

正因如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大胆取舍”。所以，本书难免会舍弃一些人们熟知和重视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会舍弃一些重要的话题，例如标准的通史著作所要彰显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及高雅文化。

本书看上去可能更像是一部应时之作，但应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以各自时代的“应时之作”的面目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宣示了各自时代的特定需要。我们史前时代的祖先想必也已酝酿出了类似的创世神话，因为他们假定万事万物，包括他们的自身、文化和习俗，在创世之初即已出现，而且注定会一成不变地延续到未来。这些观点都很自然。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证明上